

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对广西高校的调研

陈苗,黄宏春,曾叶旻琥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摘要]融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更是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本文从阵地重视程度、建设和认知上分析了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现状,认可广西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上的成就,但同时指出其存在一定的困境,原因主要在地缘政治风险与意识形态创新滞后的结构性张力、传统宣传范式与融媒体时代传播逻辑的系统性脱节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媒介融合理念偏差形成的双重短板三个方面。因此当前广西高校应从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完善网络舆论引导与机制管理、提升融媒体技术应用能力三方面入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广西高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陈苗(1991—),女,广西田阳人,右江民族医学院党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建和宣传思想。通信作者:黄宏春(1977—),男,广西百色人,右江民族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宣传、话语、具象传播。曾叶旻琥(1998—),男,广西百色人,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关节炎病变、关节退行性病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融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4KY0537)的阶段性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3002>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进入融媒体时代,随着高校师生与网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党中央及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旨在通过阵地建设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更应作为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态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应有之义。

一、融媒体时代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现状

(一)重视程度上

从重视程度上看,当前广西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普遍呈现出高位推动与末端悬浮并存的复杂态势。在自治区党委教育主管部门的强力部署下,各高校党委已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体系,校级层面基本建立了由党委书记

牵头的领导小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制度文本上实现了全覆盖。然而,压力传导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层级衰减现象:部分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仍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视为软指标,认为只要不发生重大舆情即为履职到位,在资源调配、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往往优先满足教学科研等硬任务;中层管理部门之间亦存在职责交叉与推诿,宣传部单兵突进而学工、教务、信计中心协同不足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这种上热中温下冷的状态表明,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阵地的战略重要性尚未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重视程度仍停留在会议部署与文件落实的表层,缺乏对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深刻警觉。

(二)阵地建设上

从阵地建设上看,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已基本完成物理形态的全覆盖,但普遍处于有平台

无生态、有终端无用户的效能困境。在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政策驱动下,区内绝大多数公办高校已挂牌成立融媒体中心或校园网络文化工作室,两微一端、校园号、视频号等传播矩阵初步成形,部分条件较好的高校甚至引入舆情监测系统与智慧思政平台。然而,硬件投入的快速扩张并未同步带来内容供给能力的质变:大量官方账号更新频率低、原创内容稀缺,运营模式仍停留在将传统新闻稿简单移植到新媒体端口,短视频、直播、交互式H5等融媒体时代主流形态占比极低;校级平台与院系账号之间缺乏联动机制,矩阵内部各自为战、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阵地建设存在明显的重建轻运营倾向,许多平台建成后缺乏持续的内容运维与用户运营,学生访问量、互动率长期处于低位,部分校园App甚至沦为僵尸应用,阵地物理空间的扩张与思想引领实效之间形成巨大落差。

(三)阵地认知上

从阵地认知上看,广西高校对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内涵理解仍存在窄化与泛化的双重偏差。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管理者和一线工作者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窄化为舆情管控阵地,认为阵地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对负面信息的监测、封堵与删除,而忽视了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更核心的议程设置能力、价值对话能力与文化浸润能力。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工作资源的错配——大量人力物力投向舆情监测系统的采购与网评员队伍的扩充,而对青年学生网络社群的圈层逻辑、情感动员机制、亚文化话语体系却缺乏深度研究。另一方面,也存在将意识形态阵地泛化的倾向,把学生社团公众号、班级微信群等日常交流空间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管控对象,以行政指令替代思想引导,动辄一刀切关停整改,不仅加剧了师生对官方阵地的疏离感,更使意识形态工作陷入自我窄化的困境。认知层面的偏差折射出融媒体时代传播素养的系统性短板,许多高校工作者仍未充分理解阵地的本质不是物理端口而是人心向背,不是信息发布渠道而是意义共建空间。

二、融媒体时代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困境分析

(一)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困境

从意识形态安全维度审视,广西高校面临的困境首先根植于其独特的边疆民族区位与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渗透复杂化的叠加效应。作为面向东

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地带,广西高校既是跨境学术交流、留学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渗透、民族分裂话语、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干扰的“前哨阵地”。融媒体时代短视频社交、即时通讯工具与匿名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得境外有害信息往往通过加密传输、隐蔽群聊等难以监控的方式渗入校园,传统以封堵为主的防御体系在算法推荐与圈层传播面前效能骤降。更为深层的是,广西高校学生群体中少数民族占比高、贫困生基数大,意识形态工作本应承载民族团结教育与脱贫攻坚精神传承的双重使命,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高校将意识形态安全窄化为“维稳”与“舆情管控”,缺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青年学生可感知、可认同的文化叙事的能力。当主流话语对边疆青年的生存体验与身份焦虑回应不足时,意识形态阵地的安全根基便容易被消费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极端思潮悄然侵蚀。因此,加强高校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打赢意识形态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筑牢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安全、净化社会主义办学阵地的现实需要。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重任,向来备受舆论关注。从网络舆论引导维度审视,广西高校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传统宣传话语体系与融媒体时代青年群体接受范式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当前广西高校舆论引导工作仍普遍遵循“信息发布—层级转发—量化考核”的线性逻辑,大量官方账号习惯于转载政策文件原文、刊发会议新闻通稿,却鲜少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亚文化特征进行话语转译。在广西多民族共居的校园语境中,本应充分挖掘的壮族歌圩文化、红色边关历史等本土资源,未能转化为具有融媒体时代传播力的视觉符号或交互议题,导致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在青年学生的网络社交图谱中往往沦为景观化的背景板。与此同时,面对突发校园舆情事件,许多高校的反应机制仍停留在“黄金24小时”甚至“黄金48小时”的传统节奏,而融媒体时代舆情从发酵到引爆往往只需数小时,滞后的发声窗口导致官方解释常被青年用户预设为掩饰而非沟通。当网评员队伍仍习惯于使用模式化话术进行单向灌输时,评论区非但不能成为共识凝聚空间,反而激化为情绪对抗场域,舆论引导由此陷入越引导越疏离的信任困局。

从融媒体技术维度审视,广西高校的困境既源于区域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硬件短板,更体现

在技术应用理念与融媒体传播规律之间的深刻错位。受制于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广西部分地方高校与民族院校在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往往止步于机构合并与物理空间改造,远未实现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精准分发与效果评估。与东部高校已普遍探索AI虚拟主播、元宇宙思政展厅等技术形态相比,广西高校技术应用仍大量停留在“两微一端”的基础运维层面,对算法推荐机制、交互式叙事工具、社交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引入与转化明显滞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技术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内容分发的“扩音器”,而非重构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基础设施。许多高校斥资购置的舆情监测系统,在实际运行中仅用于负面信息筛查,未能发挥数据驱动下的需求洞察与策略迭代功能;智慧思政平台多以打卡签到、答题考试为主要模块,缺乏基于行为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思想引导能力。这种技术应用的表层化,使融媒体平台沦为传统宣传工作的数字化延伸,而非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阵地的创新引擎。

(二)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困境原因分析

1. 地缘政治风险与意识形态创新滞后的结构性张力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其高校天然处于中西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境外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历史等议题对边疆青年进行渗透的企图从未停止。然而,部分高校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解仍停留在“守土有责”的静态防御层面,未能清醒认识到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已从显性的话语对抗转向隐性的文化浸润与价值解构。这种认知滞后直接导致顶层设计缺乏前瞻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尚未转化为具有沉浸感、交互性的融媒产品;边疆红色基因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被长期闲置,未能形成抵御错误思潮的本土化精神屏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面对学生群体中民族成分多元、家庭背景差异显著、国际视野参差的复杂现实,许多高校仍沿用思政课的形式结合大一统的思想教育模板,缺少分众化、精准化的意识形态供给机制,致使主流价值在部分学生中沦为悬浮的口号,意识形态阵地由此出现结构性松动。

2. 传统宣传范式与融媒体时代传播逻辑的系统性脱节

长期以来,广西高校舆论引导工作习惯于以行政指令驱动内容生产,将宣传效果简化为发文数量、转发层级、点赞数据等量化指标,却忽视了融媒

体时代舆论生成机制的根本性变革——青年学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以圈层为单元、以情感为纽带的内容共创者。许多高校宣传部门缺乏对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深度理解,依然以会议新闻、政策解读为内容主体,以生硬的说教口吻进行单向灌输,这种“语言时差”直接导致官方信息在学生社群中被自动过滤甚至反向解码。更本质的原因在于,高校舆情应对机制长期停留于“事后灭火”的经验主义阶段,缺乏基于大数据研判的舆情预警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当突发事件来临时,习惯性封锁与滞后性回应反而加剧了信息真空,为谣言与情绪化表达提供了发酵空间。此外,部分高校基于传统媒体管理形成的意识形态传播阵地管理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应对新媒体迅猛发展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形成的挑战,比如网评员队伍建设普遍忽视媒介素养与青年话语能力的培训,大量基层工作者陷入“不敢说、不会说、说了没人听”的职业困境,舆论引导由此从共识凝聚异化为自我循环的技术表演。

3.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媒介融合理念偏差形成的双重短板

广西作为欠发达地区,部分高校信息化建设长期面临财政投入不足、技术迭代缓慢的客观约束,5G网络覆盖、智能终端普及率、融媒体平台开发等基础设施与东部高校存在明显代差。然而,比硬件滞后更关键的是技术应用理念的深层偏差:许多高校将融媒体中心简单理解为机构合并与设备升级,却未能推动采编流程、组织架构、评价体系的全链条再造。技术在此类建设思路中始终扮演着辅助工具的角色,而非重塑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方法论变革。根本原因在于,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又掌握算法推荐、社群运营、数据挖掘等融媒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广西高校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上又未能打破传统行政序列的薪酬壁垒与晋升天花板。当技术团队被边缘化为单纯的运维支持部门,智慧思政平台自然沦为打卡签到的形式主义工具,舆情监测系统也只能停留在负面信息筛查的浅层应用。技术与内容、技术与思想的深度融合无从实现,融媒体阵地便始终无法从物理叠加走向真正的化学融合。

三、融媒体时代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对策研究

“对于高校而言,如果不能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领导权和主动权,高校意识形态的前

沿阵地的位置就会失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会偏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很难实现。”因此,高校必须从意识形态安全、网络舆论引导和融媒体技术应用能力三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一)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从意识形态安全维度出发,应构建扎根性与精准化相融合的价值引领体系,从静态防御转向动态浸润。广西高校亟需摆脱对传统灌输式教育的路径依赖,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心前移至文化叙事与情感认同的层面。一方面,应深度挖掘边疆民族地区的本土红色资源与优秀传统文化,将百色起义精神、湘江战役史诗、壮族歌圩文化等符号转化为具有融媒体时代传播潜力的沉浸式数字IP,通过VR虚拟展馆、交互式H5、动漫短视频等形态,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抽象的政策话语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参与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实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依托于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之间的高度耦合,因此必须建立分众化、精准化的意识形态供给机制,依托大数据分析对不同民族、地域、专业背景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画像,针对跨境民族学生、留学生、信教学生等特殊群体定制差异化引导策略。但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不断强化“制度威力”,织牢网络风险防控制度防护网,运用制度威力应对现实挑战。应主动布局面向东盟的跨文化传播阵地,通过与东盟国家高校合办网络文化节、青年论坛等形式,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冲境外渗透,在对话中筑牢边疆青年的价值根基。

(二)完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机制

从网络舆论引导维度出发,应推进对话式与数据化相协同的传播范式转型,从单向灌输转向共治共享。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工作,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坚守,需要全校师生共同协作。因此,破解舆论引导困境的关键在于承认青年师生在融媒体时代传播生态中的主体地位,推动高校官方话语从行政指令式向对话协商式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应大力培育扎根青年师生社群的本土化意见领袖,鼓励具有理论素养、网络号召力的青年教师和优秀骨干入驻B站、抖音、小红书等青年聚集的平台,以青言青语、网言网语解构历史虚无主义与极端思潮,在圈层内部实现主流价值的软性嵌入。与此同时,必须建立覆盖全网、实时响应的舆情大数据预警平台,依托语义识别与情感计算技术,将舆情应对节点从发酵

后干预前移至萌芽期引导,彻底扭转封堵删的被动局面。网评员队伍建设亦需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通过定期举办媒介素养工作坊、模拟舆情演练,使其掌握短视频叙事、表情包政治、社群运营等融媒体时代必备技能,真正成为既懂政治又懂青年的校园网红。

(三)提升融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从融媒体技术维度出发,应实施硬投入与软再造双轮驱动的能力提升工程,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融合。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基础设施短板,广西应设立高校融媒体建设专项基金,重点支持边疆地区、民族院校及地方高校的5G网络覆盖、融媒云平台开发与智能终端配置,通过省级统一采购、校际资源共享等模式降低技术应用成本。但比硬件补差更为根本的是,必须对融媒体中心运作机制进行全流程再造,打破原宣传部门、学工系统、信息技术中心之间的行政壁垒,建立“策、采、编、发、评”一体化的中枢指挥体系,使技术真正嵌入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每个环节。此外,应加强校园网络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打造一支思想政治水平高、网络技术能力强、懂得校园网络舆情特点的监控队伍,构建人工监测与技术监测相结合的具有双重保险的监控体系。复合型人才匮乏是制约技术赋能的核心瓶颈,高校应打破传统人事编制束缚,以“双师型”岗位、产业教授等方式柔性引进具备算法推荐、数据挖掘、交互设计能力的融媒专才,同时遴选优秀思政教师赴互联网大厂、主流新媒体挂职锻炼。最终目标是推动技术从辅助工具升维为方法论变革——智慧思政平台不应止于打卡签到,而应基于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实现个性化理论推送;舆情系统不能停留于负面信息筛查,而应成为研判青年思潮演变趋势的思想雷达。唯有实现技术与内容、技术与思想、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融合,广西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才能真正从建起来迈向强起来。

参考文献:

- [1]叶晖,杜兰.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困境与应对[J].传媒论坛,2025(9):34-37.
- [2]岳爱武,段红敏.网络信息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1):148-156.
- [3]孙秀玲.加强高校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以新疆高校为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7):134-142.
- [4]樊敏.改进高校对外宣传工作 提升舆论引导能力[J].中国高等教育,2014(6):58-60.

[5] 孙凤山.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挑战与应对策略[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6(6): 52-56.

[6] 沈梁燕.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建设路径[J]. 高教论坛, 2019(2): 9-12.

[7] 刘迪.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应对策略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4): 146-152.

[8] 唐爱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5): 49-55.

[9] 韦启龙, 杜莎莎, 周茜茜. 高校共青团抓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研究[J]. 神州, 2021(20): 188-189.

[10] 周锦丽. 新时代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长效机制探究[J]. 理论观察, 2021(9): 12-16.

Research on th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the Online Ideological Fro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Integrated Media—Based on the Survey of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CHEN Miao, HUANG Hong-chun, ZENG Ye-minxiao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nverged media, online ideological work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which aims to establish the mindse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fronts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phasis, construction, and cognition. It recogn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fronts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but also points out certain difficulties.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ree aspects: the structural tension between geopolitical risks and lagging ide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ystematic dis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propaganda paradigms and the communication logic of the converged media era, and the dual shortcomings caused by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and deviations in media convergence concepts. Therefore, Guangxi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ideological fronts by enhanc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education, improv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mechanism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converged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era of converged media; Guangxi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